

祖先与永恒

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

〔英〕杰西卡·罗森 (Jessica Rawson) 著

邓菲 黄洋 吴晓筠 等译



Ancestors and Eternity:

Essay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 / (英) 罗森著；
邓菲等译。—2 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8
(开放的艺术史)
ISBN 978-7-108-06029-7

I. ①祖… II. ①罗… ②邓… III. ①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7683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5.5

字 数 545 千字

印 数 06,001—12,000 册

定 价 9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关于作者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 1943— ）教授是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杰出的西方学者之一。1975—1994 年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94 年以来任牛津大学中国艺术考古专业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以及其最古老的学院——墨顿学院院长。1990 年荣膺英国学术院院士。为表彰她对中国研究的突出贡献，2002 年英国女王授予其爵士头衔。2009 年应台北史语所之邀任“傅斯年讲座”教授。

罗森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极为广泛，包括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以及青铜器在后期的复兴。她注意考察“成套”青铜器在商周礼仪程序中的作用，该理论在探讨青铜器发展方面卓有成效。玉器方面，罗森教授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上古玉器在后期的保存及重新使用，比如商代妇好墓中就发现了许多被重新使用过的上古玉器，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

近年来，罗森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墓葬结构发展的研究，试图展现古代墓葬是如何为墓主人与建造者所理解。她探讨了早期中国（从商代至汉代）整体墓葬形式的演变，同时中国与亚洲内陆地区的交流联系也是她关注的主题之一。

罗森教授还致力于一些晚期的题目，如在伦敦筹办“盛世华章——康、雍、乾三代帝王”艺术精品展，向西方社会重现中国的三朝盛世和丰富艺术内涵。在对晚近中国艺术的研究中，她对“装饰”的运用有着特殊兴趣，侧重西方与东亚装饰传统的比较研究，进而揭示这两个区域重要的文化差异与相似性。

本文集收录罗森教授三十五年来在以上领域的研究论文 17 篇，大部分完成于 2000 年之后，尚为首次以中文结集发表。

总 序

主编这套丛书的动机十分朴素。中国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艺术史，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艺术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这份遗产的认识与理解不仅需要中国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设性工作更为重要。实际上，关于中国艺术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写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鲜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

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与方法的进展得益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与著述。20 世纪完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建构。这项建构应该体现在美术考古研究、卷轴画研究、传统绘画理论研究和鉴定研究上。当然，综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大陆的中国艺术史学曾经尝试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经验。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处在当今的学术前沿。有些研究的确是近几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则曾经是当时的前沿性的研究，构成我们现在的知识

基础，在当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比如，作为丛书第一本的《礼仪中的美术》选编了巫鸿对中国早期和中古美术研究的主要论文 31 篇；而巫鸿在 1989 年出版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包华石（Martin Powers）在 1991 年出版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柯律格（Craig Clunas）在 1991 年出版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巫鸿在 1995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大规模与模件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乔迅（Jonathan Hay）的《石涛：清初的绘画与现代性》（*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上的纹饰、徽识与图形刻划解读》（*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 Décor, Pictographs, 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等都是 2000 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也会陆续选编到这套丛书中。

除此之外，作为我个人的兴趣，对中国艺术史的现代知识系统生成的途径和条件以及知识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须予以关注。那些艺术史的重要著述无疑都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最好范本，从中可以比较和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产生的极其出色的艺术史写作，反思我们共同的知识成果。

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出来。这一现象也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字为核心的，而缺少同

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的新文化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不完全是提供给那些倾心于中国艺术史的人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是提供给热爱文化史的人们备览的。

我唯一希望我们的编辑和译介工作具有最朴素的意义。

尹吉男

2005年4月17日

于花家地西里书室

前言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我一直致力于中国考古与艺术的研究，先后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以及牛津大学考古系教授等工作。在这几十年中，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撼动着我。作为一个欧洲人，我非常留意中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差异。在那些地区，古埃及、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成就为西方艺术与物质文化奠定了基础。千百年来，那些饰有神、人雕塑及绘画的石质建筑一直被视为西方艺术的经典。中国的情况则十分不同。古代青铜器、玉器是物质文化的核心，其中最精美的艺术品与统治者和贵族阶层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提供了中国艺术精髓——书法——的最早例证。更重要的是，中国精湛的陶瓷、纺织技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世界其他地区从未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我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成套青铜器在礼仪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后世对早期青铜器器形及纹饰的复兴。我对成套器物功能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赛克勒青铜器收藏之时。部分藏品现在陈列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辖下的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见本书收录的第 2、3、4 篇论文）。当时，我应邀为一批西周青铜器编纂图录。这一工作使我更加了解公元前 9 世纪左右青铜器

器形的变化。许多学者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一显著的变化必定伴随着礼仪的变革。商代及西周早期对成套青铜器的使用在此时突然中断。新的器形开始流行，并且以多件重复的方式构成器物组群。这些新型的青铜器可能对应着礼仪活动中的新变化。不单是礼仪上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阶层的社会结构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需注意，当商代或西周的成套器物被使用时，它们是当时人们理解礼仪观念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们的部分思想和信仰隐含在这些成套器物中。但殷商成套器物所蕴含的观念与西周成套器物中涉及的思想内容有所不同。成套器物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比如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或用于作战的兵器。在这样的观点下，这些器物不仅有助于理解特定时期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与这些青铜礼器相关的信仰和习俗。

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方面，即后期对早期器形和装饰的复兴，也能反映出这些晚期器物铸造时的社会情况。自商代以来，人们便对较早时期的青铜器十分着迷。我们可以在商代晚期、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早期青铜器的复制品。这些时期的贵族都希望以他们与历史的显赫联系来提醒自己以及后世子孙（见第 5、6、7 篇）。与过往历史相关的见证无疑为拥有这些器物的家族带来崇高的地位。后来的帝王们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复制古代青铜器。

如果我们想更深入地透过早期器物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及观念思想，各个时期的墓葬可以提供另外的线索（见第 8—12 篇）。中国具有悠久的墓葬传统。墓葬为其墓主提供了一个完备的死后世界。早期的竖穴土坑墓是古代青铜器和玉器的宝库。这些宝藏不但为它们的所有者提供了礼仪及身份所需的物品，也配备了战争所需的兵器和马车。秦代（公元前 221

—前 210 年）以来的墓葬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其中以兵马俑的出现最为突出。秦始皇陵不仅仅提供了军队，墓中的车马厩、朝臣、百戏、官员、嫔妃，以及天地星辰的图像，都是为了秦始皇的死后世界而创造的。如同随葬的青铜器一般，这些为冥世所准备的物品是古代中国人死后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自秦代以来，墓葬成为墓主人的微缩宇宙。这种始于秦始皇时期的转变，一点也不亚于一场革命。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商代与汉代（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的墓葬来理解上述变化。汉代贵族以漆器和玉器取代了成套的精美青铜容器；这些器物与侍从木俑或陶俑放置在一起。另外，最高等级的贵族通常身着玉衣。随葬品上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和信仰上的转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玉衣等贵重物品以及陶俑等模型，都被用来在死后世界发挥作用。我们还应认识到，壁画中的侍从、宴饮以及山岳都为墓主人提供了它们所描绘的事物（见第 12 篇）。因此，我们不应将陶俑与其他物品区别开来。包括墓室壁画在内的一切，都为墓主的实际需求服务。

汉代墓葬的改变一部分源自于楚国习俗的影响，一部分可能来自于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地区。墓前的动物雕塑及凿山为藏的石室墓对石材的使用，都表现了中国与中亚及伊朗地区的联系。在那些地区，石头是雕塑与建筑的首选材料，并且同样有凿山为藏的石室墓。中国在秦汉时期已经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了全球化的早期阶段。

的确，通过对中国早期青铜器、玉器以及墓葬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将欧亚大陆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最东端的是中国，及其影响所及的韩国、东南亚等地。最西端为地中海沿岸地区，及其影响的北欧及西亚等地区。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中亚广阔

的沙漠和连绵的山脉，以及现今俄罗斯、蒙古地区的草原地带。在该区域内，游牧民族及商贾使中国与西亚间的交流得以存在。本论文集集中的两篇文章（见第 13、14 篇）讨论了这些地区之间的交流。外来物品促进了新的材料及事物在中国的出现。古代中国人借用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红玛瑙珠，在西周晚期创造出全新的葬服样式（见第 13 篇）。

本书最后三篇文章将继续讨论欧亚大陆的不同文化，探讨较晚时期的装饰或图案（见第 15—17 篇）。这里，我将进行一个对比，一面是中国晚期流行的花鸟吉祥图案，另一面是以古希腊、罗马建筑系统为基础的西方图案。这两个区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然而，西方系统的部分元素随着佛教由印度次大陆传入中国。另外，中国的花鸟图案随着丝织品及瓷器传入印度、西亚，然后进入欧洲。现今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仍广泛使用的青花瓷，便是当时中国出口贸易瓷的派生物。我在关于装饰的论述中，以及其他的文章里，都专注于研究前人留下的丝织品与瓷器，这不仅是为了理解当时的贸易与交流，更是为了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信仰模式。例如，通过分析万历皇帝（1573—1620 年在位）的龙袍，我们可以思考当时的两种信仰：龙袍上吉祥图案的作用，以及龙袍将普通人转化为皇帝身份的特殊力量（见第 15 篇）。中国青铜器、玉器、陶瓷或丝织品上的各种创造，都与当时的社会习俗与观念的变革息息相关。

我要感谢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参与翻译工作的学生们：邓菲、吴晓筠、陈谊、黎婉欣、陈莘、蒋奇栖、曾庆盈、陆于平。其中，邓菲担任统筹工作，我十分感激她为此书所付出的努力。另外，北京大学的黄洋教授对所有译文进行了细致的修订。社科院考古所的赵超教授也协助校对译文，确保译文专业词汇的准确性。此外，我还要感谢梅建军教授为

《装饰纹样与地域——汉中青铜器的个案》一文所做的贡献。
最后，我要向长期投入本书的三联书店的编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杰西卡·罗森

2009年2月23日

目 录

前 言	1
青铜器	1
01 装饰纹样与地域——汉中青铜器的个案	3
02 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	20
03 西周青铜铸造技术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	48
04 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礼器变化	63
复古维新	101
05 古代纹饰的复兴与过去的呈现——来自商周青铜器的例子	103
06 复古维新——以中国青铜器为例	126
07 中国青铜器的传承	155
墓 葬	171
08 中国的丧葬模式——思想与信仰的知识来源	173
09 图像的力量——秦始皇的模型宇宙及其影响	211
10 西汉的永恒宫殿——新宇宙观的发展	241
11 作为艺术、装饰与图案之源的宇宙观体系	307
12 中国山水画的缘起——来自考古材料的证明	355
中西交通	395
13 红玛瑙珠、动物塑像和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公元前 1000— 前 650 年前后周及其封国与亚洲内陆的交流迹象	397
14 中国的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	463

装饰系统 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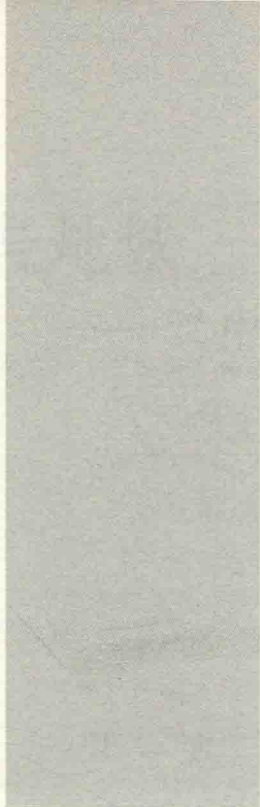
15 万历皇帝画像的载体作用 485

16 装饰系统——中国的花鸟图像 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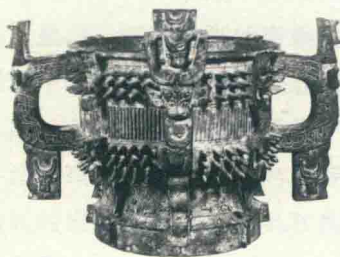
17 “盛世华章展” 综述 525

文章出处..... 541

杰西卡·罗森学术简表..... 544



青 铜 器



装饰纹样与地域

——汉中青铜器的个案

引言

汉中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诸多值得注意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多样的装饰类型。其中一些高品质的器物，可能来自郑州、盘龙城或安阳的商代作坊。不过，它们出土的地区与商的中心地区相距甚远。而且与之相关的其他青铜器也不太像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产物。汉中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看上去很像湖南、四川和安徽的青铜器。有些器物相当粗糙，很可能是当地的制品。最后，汉中类型的青铜器均未发现于商代中心地区的典型环境中。殷商中心地区的青铜器以成套的方式制作和使用，并常大批随葬于墓葬之内。^{〔1〕} 这些似乎都不是汉中地区的做法。相反，汉中的青铜器发现于广泛分布的小窖之中，与主要的居住中心或墓地没有关联。而且，与它们同时出土的武器、工具和配件，也未带有任何黄河流域殷人地区的典型色彩。

区分这些不同的考古地域比较容易，但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能够同样容易地辨别出哪些器皿为商代主流的青铜器，而另外一些为典型的边远地区的产品。本文将通过观察汉中出土并已发表的一些青铜器，从器物的装饰特征入手，去探讨分辨这些青铜器的方法。^{〔2〕}